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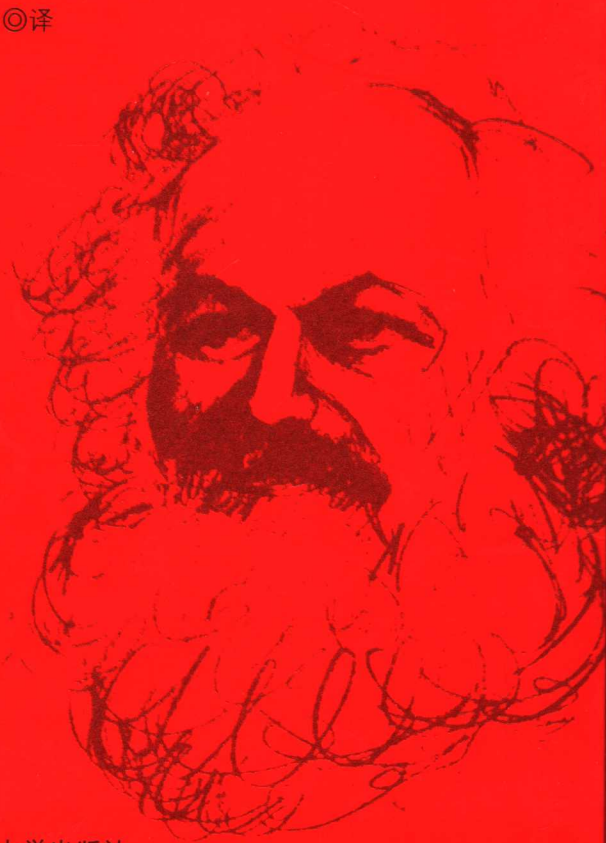
CHINESE
DIALECTICS

中国辩证法：

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美]田辰山(Chenshan Tian)◎著

萧延中◎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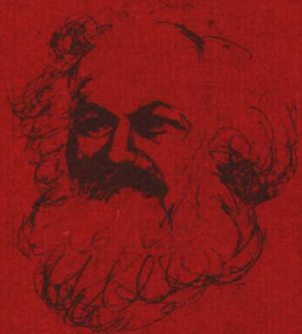
CHINESE DIALECTICS

中国辩证法：

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美]田辰山(Chenshan Tian)◎著

萧延中◎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 [美] 田辰山著；萧延中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09218-8

I. 中…

II. ①田…②萧…

III. 辩证法-哲学史-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0374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美] 田辰山 (Chenshan Tian) 著

萧延中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2.2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0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李景源 叶汝贤 陈学明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鲁 路 鲁克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 雷 刘元琪 李惠斌 杨学功 陆 俊

郑一明 郑吉伟 段忠桥 聂锦芳 曹荣湘

梁树发 韩立新 曾枝盛 魏小萍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愿意将自己的新作纳入丛书。为此，我谨代表本丛书编委会对各位尊敬的读者、作者、译者、出版者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工作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随着实践的迅猛发展，思想理论发展的步伐也日益加快。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断推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2004年以来，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交相辉映，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理性。从国际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运用的普及，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如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全球社会治理、世界体系演进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国际学术界很多有识之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是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的关系、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研究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还从当代人类的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新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及其发展源流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对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为推进我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事业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我国近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新作，译介给我国读者。其中，有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研究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规律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的未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有的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成果，如生态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等，可以给我们思考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启发。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这些作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08年3月28日于北京西单

序言一



杨金海

朱熹写过一首诗叫《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一本书能够给读者这样的感受，在读者的脑海里呈现出天光云影的美景，从而激荡起无限美妙的思想活水，那这一定是一部好书。田辰山先生的新作《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读着书稿，我深感有一种已经久违了的哲学反思的冲动，有许多纯粹理性的问题涌现于脑际，或时隐时现，或茅塞顿开，或游思于中外，或仰俯于古今，有一种游目骋怀的乐趣和理性升华的美感。

“问题”的提出一向是标明着人的某种存在状态。由于每个人的“存在世界”不同，境遇不同，所“碰”到的“生存之壁”各异，思考问题的意向性有别，故而对同一事物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的所指，所依据的材料也常常有别于他人，结论当然也就极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然而，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别，“交流”才成为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只有通过交流，人们各自原本孤立的“自在世界”才能相互碰撞、彼此打通、交融互射，从而逐步形成“共在世界”，实现在某一问题上的“共识”。人类认识的进化大多要通过此种途径。

田辰山先生在本书中提出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存在于中国语境中的这种形式”。这个问题对中国学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转化成我们习惯的说法就是“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由于作者长期在美国从事理论工作，又有一定的中国文化背景，研究这个问题的视角和境遇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无论就其分析理路还是得出的结论而言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引发我们多方面的

思考。

作者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人所说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指涉的并不是同一种内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中国思想之间显示出的“第三种路径”。尽管这些说法与我们通常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是鲜明而中肯的。的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理论结晶。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讲了多年，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相结合，并在今天和未来如何继续承接和发展的的问题，缺乏学理上的透彻分析和深入研究。

可贵的是，田辰山先生的结论是在深入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得出的。尽管该书的书名涵盖面比较广泛，但实际上它不是一本中国哲学史著作，也不是一本关于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而形成今天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作。作者重点研究的是，中国人是如何获得对来自西方的辩证法（“dialectics”）的理解的。换个角度说，作者要说明的是，中国人是如何把中国传统的“通变”思想体现在“dialectics”（辩证法）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被中国人所广泛接受的思维模式的。

作者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精髓及其与西方辩证法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值得认真体味的。他在分析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辩证法的研究得失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辩证法思想，借鉴郝大维、安乐哲关于中国哲学的“互系性”（correlative）思维模式的理论，提出了“通变”（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概念，并把它看作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鲜明特征。在他看来，西方传统辩证法的核心是二元论，即主客对立，不可以通约，所以常常出现二元分立观点，要么是唯物论，要么是唯心论；要么是决定论，要么是意志论等。中国的辩证法则与之有很大不同。尽管中国辩证法中的核心思想也是“两极性”（polarity），如《易经》中的阴阳概念，但在这里，二者的关系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不可分离的。阴阳、高低、上下、祸福，乃至主体与客体等等的关系都是“互系性”地联系着的，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尽管有主要与次要方面的分别，但没有绝对的永恒的分立，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之间可以转化。换句话说，在中国人的辩证法里，也有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不是西方的那种“本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而是中国式的

“事件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也就是说,在中国辩证法中,从来就不是执于一端,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系;把这个观点应用于实践,就是主张“变通”,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坚持“权变”,灵活把握事物的发展态势,保持事物发展的和谐状态。

我认为,田辰山先生关于“通变”思想的论述把握了中国辩证法的精髓。顺着这一思路前行,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直接体味中国人思维结构深处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能够从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处窥见解开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古今贯通、不断绵延繁荣的智慧锁钥。不是吗?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而一以贯之,又不断发展,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仅见的,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的开放包容而又不断革故鼎新的精神是重要原因。譬如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外来文化传入,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每一次面对外来文化都不是简单地将其拒之门外,而是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学习和吸取其中的精华,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于是便出现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观: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发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而繁荣于中华大地。广而言之,中国的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情况是其他民族国家所难以比拟的,但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西方意义上的文化冲突,更没有宗教战争。在不少地方的寺庙里常常可以看到儒、佛、道三教并存,和谐相处的情况。这种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现象,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中国人的这种开放包容精神根源于何处?从哲学上讲,这与中国人很早就养成的这种“生生之谓易”、“通变之谓事”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既是一种宇宙观、辩证法,又是一种生存论、价值观,还是一种主体的实践哲学、处世之道。中国人历来讲究“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把那些不可证明的超验的东西搁置起来,不让它们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所以,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诫。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哲学具有这种很强的实用性,它很难发展出西方人那种绝对超验的哲学逻辑体系来,更不会有西方那种至高无上、逻辑严密的神学理论体系和坚实的神学信仰体系。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但却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人的实践理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论作为形而上的“道”,还是作为为人处世的“理”,抑或作为形而下的“器”,都是为人的现实生活服务的。所以,中国人讲的“道理”,不是指纯粹物质世界的规律,而更多的是有人参与其中的“事理”。由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日新月异,所以中国人特别崇尚“变易”,力求在变化中求得自己的“常存”。“变通”就是最重要的“事理”。“变则通,通则久”,既被认为是一种事物的客观规律,又被理解为主体的实践之道。这同中

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一致的。

田辰山先生以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精神的深刻洞见为基础，透彻分析了“通变”思想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同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遇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并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说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点。他还以此为根据，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所有这些，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乃至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和走向，并促进中国人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作者的有些观点不一定与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致，有的用语也带有西方学者或作者自己的特色。这些就留待读者去辨析和评价吧。

序言二



[美] 安乐哲 (Roger T. Ames)

这是一部及时的书，一部重要的书，一部颇显洞见的书，这也是一部具有先见之明的书。在《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田辰山对辩证哲学之新兴的、历史性的和特殊的解读，进行了辨析，这一辩证哲学在20世纪超过2/3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化中明显地占有支配地位。目前，至少在名义上，中国哲学已从一种“毛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一种驳杂的“新儒学”，但作为一种传统中国思想的恒久主题，那种被田辰山概括为“通变”形式的辩证法，却仍然在现在流行的众多思潮中显示着持续的生命力。

田辰山把分析焦点突出地锁定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纯粹中国版本的新兴形态上。在传统中国的思维路径与作为西方政治流派之一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界面，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是从这一与其具有关联的交互界面中汲取思想营养。虽然梳理的历史和思想文献脉络是非常广泛的，但田辰山真正实现的有说服力的论理，是很具体的。用细致、具体的分析，田辰山在一场“汉学革命”中喊出了他自己的声音。这场“汉学革命”倡导“以中国自己的情况去理解中国传统”。他是从分析一些现代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化约主义入手的。许多西方解释者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二元二分法，以“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分割开来的方法。另外，他们有的人又拒绝接受上述二元性的分析方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化约成一种互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其自身从来没有的东西，并同时忽略掉了需充分体会的“毛主义”所明显具有的中国特色。

田辰山的入手之点也是近些年西方学术界所作的努力方向，区别在于：一方面是建立在神学本体论宇宙观之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假设；另一方面是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印欧经验的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的、互系性的宇宙观。前者的形而上学认知是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它诉求某种独立和超越的本源，以此建立、支撑伟大的设计，这个设计在我们面前以二元辩证形式展开。而在《易经》中存在的范例形式的互系性宇宙观，则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它期待的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合作所可以实现的和谐。

为了分析毛的偶然性辩证法与黑格尔目的论的必然性辩证法之间的差别，田辰山通过回溯、考察一些中国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瞿秋白等），向人们揭示，即使在辩证唯物论原理最早移植的形式中，已明显具有中国的面孔。田辰山发现，在瞿秋白的文稿中，马克思主义语言中融入的传统中国用语，已然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中国环境。通过概述辩证唯物论反对者（如张东荪、张佛泉和叶青等）和倡导者（李达、艾思奇等）之间的争论，田辰山指出，这种对话形式的扩展和延伸，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意义，使它变成一种针对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和当时条件的理论。艾思奇为了使作为哲学理论的“门外汉”的人们能通晓艰深的哲学话语所做的通俗化努力，只是在实现理论抽象性与日常实践真实性统一上的一种最显而易见的运作。而这恰恰正是互系思维所具有的特性。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定形的通俗表达，是成就于毛泽东本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通俗化著作中。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经典与外国“主义”之间最开放的互系关系。这一具有鲜活力量的实践本身，就是“通变”思维的范例。田辰山在结论中认为，要想理解当代政治词汇不断中国化的转义情形，例如“法治”、“理性”、“权利”和“民主”等等概念的本身转义，对“通变”思维的深刻领会是必要的。于是，要确定一种中国未来将采用的进化的民主版本形式，“通变”思维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力量。

此外，在对20世纪中国史的这一叙述中，还有其他的政治学和哲学的重要启示。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毛主义时代所做出的深远贡献和一些过分的举措，都必须作为中国经验的整体构成加以理解。毛泽东不是外国人的出常现象；他是一位中国哲学家，而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哲学层面上，中国“通变”思维可对一个刚刚兴起的西方哲学话语做出很多贡献，这一话语在其后的达尔文批判中，正在清洗其自身所一直持守的神学本体论宇宙观假设。也就是说，一个中国自然宇宙观与西方新兴的过程意识之间的汇流即将出现。中国自然宇宙观于生生不息的互系关联之中发现了秩序的意义，而处于崛起之势的现象学、解释学，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

义等的过程意识，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西方哲学。换言之，西方所习惯的“原动者中心”概念意义上的创造性（它创自于无，为意义的来源提供原始出处）这种概想，将让位于一种根本上由情势决定的概想，而情势决定概想的创造性理念，在生生不息互系的关联中，是意义的聚合性产生。这种极其深刻的变化将使传统中国哲学成为灵感的源泉，成为西方哲学思维新方向开拓的批判武器。同时，它也为把旧“比较哲学”带入切实的全球性“哲学化”新时代，提供一个平台。

这正是像田辰山这样的学者的创新思维。他们的创新思维将使具有鲜活力量的“通变”实践成为一条新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参与其中，创造出文化比较的丰硕新成果。

中文版序



夏威夷，午夜已过，偶尔有远处传来的飞机起飞或汽车驶过的声音，相伴的也有凉爽的风吹动窗的声音；否则，人们正在酣睡，十分静寂。

我的英文著作《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马上要出中文版了，需要写个《序》，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课题，它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让自己的思路回到这个问题上，油然而生的第一个感觉是时间过得好快。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已花去了我十几年的时间；起初决定做这个研究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不过对当时的回忆，立刻激活了心中曾经的兴奋，也带来现在的欣慰。

记得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美国求学的一些年，我经常发现，在中国学到的西方学术概念所带有的含义与它们的英语对应词汇原本的含义相去甚远。比如，汉语“超越”不含英语“transcendence”的本质割裂性的深层含义；“辩证法”较之“dialectics”，更具有相反相成的含义；“矛盾”与其说是英语“contradiction”，不如说是“一矛又一盾”；“普遍性”不是“universality”，而是“无处不在”；英语“unity”通过汉译变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统一”，也基本失去了它原有的深层含义；“理论”一词，延续着的本是宋明理学的含义，已不含英语“theory”“未经证明假设”的基本含义；“实践”和“practice”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样互不相识。

于是，我开始想，中国人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否不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意？几乎是在思索这一问题的同时，我接触了郝大维、安乐哲两位比较哲学家关于中西方思想传统存在结构性差异的论述。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基本上有一种难以意会、不易言传的东西，那

就是两种宇宙观、思维方式乃至两种语言上的结构差别。这是在语言具体使用情势和场合中双方无法察觉的东西。明确地说，即一方面是西方人心灵深处的超绝主宰体的宇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结构，另一方面是道和万物的自然世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通变式互系性思维结构。不过，作为一个短《序》，这里不能展开阐述这两个迥异的结构。我只是点出，如我在上面提出的，通常被认为是可以互译的汉语与英语的对应词汇或概念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结构差异。这是问题的关键。

在夏威夷大学求学期间，曾有机会选修郝大维教授的课程，也有幸成为安乐哲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使得对他们的比较哲学理论有更系统的研究，也因此而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此外，选定这一课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西方学者之间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尽管各持一说，但他们在“马克思是决定论，毛泽东是意志论”的观点上几乎达成了共识。而我自己的观点则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两人都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意志论；西方学者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中国语境下的“辩证法”视为是欧洲语境下“dialectics”的完全同一概念；这正是忽略了两种思想传统概念和语言之间存在的结构差别。这样，我最终决定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当然，原来英文的著作是写给西方读者的。现在从英文翻译到中文，原来西方语言的意境已经消失了。换成了汉语的意境，在中文翻译的基础上去理解书中阐述的问题，哪怕是可读的，但毕竟与原来的结构不一样了。这又是那个难以意会和言传的东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对中国读者来说仍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从两大文明和思想传统的广阔视野所进行的比较，应当说，这是具有创建性的；二是此项研究本身其实是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如何中国化了的问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之众多前辈的基础上，我涉足了一个更为深入复杂的层次。

不过，由于我的工作澄清辩证法之中国人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原来哲学含义之间的差别，因而也随之会引出新的问题。我在想，可能有人会根据这一研究结果提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的观点，甚至还会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而如果真正理解这本书的研究所展示的逻辑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误解的。不错，我确实是做了在哲学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的工作，但如此做是为了真正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与为了将二者割裂开来而进行的分开工作显然是不可等同的。

如果说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

从两个方面回应了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解；一方面，这种误解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割裂开来；另一方面，又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割裂开来。这两个误解，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面临的理论挑战。本来来自这两方面的挑战本身会构成相反逻辑的学术理论论敌，而现实中它们之间的争论却并不多见。随处可见的反而是它们不约而同地从两个方向都将矛头对准一个对立面，不能不说这种情势已经超出纯学术或理论之争的范畴。

我的这个研究成果，对中国读者来说所应产生的启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思想传统不是对立的，而是延续的，是现代历史性的与时俱进——二者不可断裂；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是无法割断的。没有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也就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术语装备的、在现代获得延续的中国哲学传统，特别是在历史和政治思想的意义上，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历史过程中实现的一种结合。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把这项研究的启示，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畴之中。它在一个更高和更深的维度上提示，在当下以及未来，中国的思想与哲学理论工作者在将任何西方思想概念引入中国的语境时，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即要意识到，理论的和历史的经验表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与中国的通变互系思维之间的结构差别，往往成为两种文明背景中的人们在认知和判断上相互误解的关键。

我特别想借《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文版出版的机会，对一些不熟悉西方思想结构但却以西方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中国人说，这种认知，其实是等于在拔自己的头发，臆想让自己离开中国的土壤，这恰恰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传统浅层文化的表现。

愿以此序要旨与读者共勉。

作者谨识